

# 嚮往香港的日本女子

小 冰



在九州的最後一個晚上，回到民宿幸子的家，她剛剛做完家務，正坐下歌會兒，我順勢落座沙發。一會兒，大家又扯到婚姻。她說：「在日本的涉外婚姻中，九成以上是男性娶外國妻子。女性則多數選擇本國男性，條件大概以『三高』優先，身材高、學歷高、收入高。」我告訴她：「在中國，這些男人被稱作『高富帥』，這些女人被稱作『白富美』。」

幸子很像一個女性問題專家，對婚姻和女人頗有研究。她繼續道：「婚後的日本女性，普遍不願意離開本國，對條件極好的地方，也顧慮重重。但是我有個朋友例外，她嚮往香港。」「真的嗎？這怎麼講？」我希望聽她接着說。

故事展開了：「她婚後隨丈夫去香港生活，休假回國時告訴我，她很羨慕香港女人，覺得香港女人獨立，婚後大多繼續工作。我說過，日本女人與男人同工不同酬，升遷機會小。這些因素如果是在香港，小多了。香港老闆不像日本老闆那樣過於在乎你已婚與否，離婚已否，與誰結婚，什麼原因離婚。但是，一定在乎你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成效，事情做得好，就重用你，同工同酬，挺實在的。」

她把香港看成女人的烏托邦，我不贊同，對她說：「也有不少香港女人婚後不工作呀！」聽之，她反而給我介紹起香港來：「許多香港女人不但比我們有工作優勢，即便當家庭婦女，也有自己的社交圈子，三天兩頭約朋友飲茶，一坐就是兩三個小時。」經她這麼點出，我倒覺得，還真是那麼一回事。沒想到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竟然令她的朋友羨慕。

# 本港曾有九座的士

過來人



今天大家在香港市面上見到之的士，乘客數量都限制在四或五位，但其實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曾經出現過一種可以搭載九名乘客之的士，因只能運送乘客由新界至市區之間，所以被視為新界的士前身。

由於載客較多的關係，使用的車種也與坊間的士不同，而且當時仍是英國車主宰市場，因此業界大多採用由英國生產的COMMER（譯名「金馬」）客貨車改裝而成。這種的士的一大特點是政府規定車窗對下的車身要漆上一條由黑白四方格仔組成的腰線，人們索性稱之為「階磚車」。在車頭和車尾，都掛有一個半圓的綠色鐵牌，與現時的士使用的一樣，但上面的TAXI 4或5 SEATS字樣則改為TAXI 9 SEATS。如果有人仍然擁有的話，那是相當珍貴。

當時的「階磚車」不會在街上兜客，而是在站頭輪候，筆者還記得荃灣衆安街是「階磚車」的總站，來往地點包括深水埗青山道和油麻地佐敦道，收費每位六毫，其經營模式與今天的公共小巴非常類似，只是行駛路線和範圍及限制不同而已。

一九六七年有一段時間，巴士公司員工發起罷工，令港九新界所有巴士路線停駛，市民出入大感不便。在此情況下，很多可以載客的交通工具都不顧法例規限而充當巴

又聊到夫妻關係，我給她講一個中國夫妻相處的故事：「一對成都小夫妻在家度周末，太太半夜想吃酸辣粉，丈夫嫌食店遠了，勸她放棄。她不依不饒，非逼着丈夫出去把『愛意』踐行回來，才停止數落。」這下把幸子聽得六神無主，她思索半天，得體地回說：「日本丈夫沒有寵妻的習慣，也沒有西方紳士文化裏的『女士優先』。」

在日本傳統中，女人被禁止從事一些職業，如相撲、山洞作業、杜氏（釀酒師）等。相撲被看作力士活動，是男人幹的事情；山洞作業，據說山神是女的，女性進洞會遭她嫉妒，引發事故；酒是奉獻給神的，要乾淨。我告訴她：「現在的中國，女人『能頂半邊天』，沒有太多的禁忌。」她贊同我的說法，認為：「當下的反禁制是全球性的，日本現在也有女相撲、女山洞作業員、女釀酒師，但是地位沒有男人高。」

她想起了日本女足：「日本女人的權益在不斷改善，但是依然男女有別。有『大和撫子』之稱的日本女足，你聽說過嗎？」她喝一口茶，看看我的反應。「知道，好像『大和撫子』之說，相當於中國的賢母良妻，是嗎？」「是的，還有外柔內剛之意。日本女足在二〇一一年的女子世界盃上奪得冠軍，二〇一八年的亞運會上又奪冠軍。但是二〇一二年，在前往倫敦奧運的途中，同是國家隊，男足乘坐商務艙，女足乘坐經濟艙。比賽結束，女子隊贏得銀牌，回國才升到商務艙。」幸子的語氣溫和平淡，內容卻實事求是，雷打不動。「不少香港女人婚後隨夫姓，你們也是吧？」我明知故問。「必須的，就連皇室女兒絢子出嫁，婚後也得脫離皇籍，隨丈夫『守谷慧』，改姓為『守谷絢子』。」

士角色，當中自然包括「階磚車」，甚至連貨車也加入載客行列，大大解決了市民需要，港英政府對此亦「隻眼開隻眼閉」。皆因這些並非法定載客工具，車資方面無法管制，總之乘客與司機之間你情我願，即使收費比巴士貴一兩倍也不愁沒有人幫襯。

筆者的叔叔當時亦曾以貨車加入這個行列，在車斗上放多張棧仔，從九龍到新界沿途上有有落，每位五毫，一天下來埋單計數都幾和味。行走開新界之九人的士，就打破地域界限，乘機去市區兜生意。當然，這樣的經營方式只是權宜之計，因為這些非法載客車經常在大街路口和巴士站、電車站等客，阻塞交通，不能長此下去。

到了一九六七年底，香港局面開始平穩下來，巴士亦陸續恢復行駛，港英政府有見及此，打算取締九座的士。不過因為這類車有一定吸引，香港市民亦有聲音要求不要取締，提議發牌管理。港英政府衡量過意見之後，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三日公布，會將小巴分成兩類：一類叫公共小型巴士，即係現在的小巴；另一類叫私家小型巴士。前者可以在街上兜客收費，最多可以載十四人，除了有限制的地方，其他地方都可以上落客；後者不可在街上兜客，通常用作學童巴士，或者私家巴士。

這個計劃當時曾有的士商會反對，不過立法會最後三讀通過，成為法例。自此，公共小型巴士就取代了九座的士角色，而九座的士亦從此在市面上絕跡。



►上世紀六十年代曾出現的九座位的士 作者供圖

# 新媒體時代的「五分鐘閱讀」

賴秀敏



今天，青年一代的閱讀時間大部分交給了屏幕。屏幕上的閱讀，是雜亂的、碎片的、即時的，同時也是速朽的。被「捆綁」在新媒體上的閱讀，在碎片時間中部分地形塑了當代青年對現實人生的認識。新媒體上的一篇文章，從被打開到閱讀完畢的時間，往往只有五分鐘。正是在這些形形色色的「五分鐘」背後，新媒體時代閱讀的形式與內容進入當代青年的文化結構，從而構成一代青年的閱讀生態。

五分鐘的閱讀，能帶來什麼？會帶來什麼？回溯互聯網的發展史，可以看到，在以「微信」為標誌的新媒體時代宣布崛起之前，「微博」已然為新媒體時代中「五分鐘閱讀」的內容生產模式提供了充分的孵化空間。

在這個空間中，若論及當今新媒體寫作的史前造物，不得不提的是曾點燃過內地萬千少男少女之心的「睡前故事」。它們的作者張嘉佳後來和王家衛合作，製作了電影《擺渡人》，名噪一時。

很多人說，難以理解拍出過《一代宗師》、《花樣年華》的王家衛會和張嘉佳合作。也

有人說，正因為張嘉佳，我們得以重新理解王家衛。尤其在張嘉佳故事的都市景觀和情感脈絡中，我們能看到王家衛的《重慶森林》和《墮落天使》的映像。

就故事文本而言，在語言上，張嘉佳糅合了王朔、王小波、周星馳的電影對白，在讀者熟悉的文化系統裏摘取語言資源，不僅祛除了讀者的陌生感，而且形成了一種特殊的語言風格：空洞的華麗。在內容上，張嘉佳在文本中灌注了與自己相類的一代青年的愛恨情仇。所有的錯過都沒有因果，所有的終點都倉促而過。這些人從不會對生活的任何一個實質問題進行深入思考，世界於他們而言就是一個表象。他們的經驗都是稍瞬即逝，從不沉澱的。因此，在張嘉佳的故事中我們看不到感情，只看得到情緒；看不到情節，只看得到金句。

實際上，以上這些設計都預設了兩個前提：一是當代都市讀者對深度閱讀的需求性並不高，甚至可以說很低。二是相對過去的歷史，當代青年大多只在意作為表象的現世。

從傳播角度而言，張嘉佳的「睡前故事」屬於「私人定製」。在今天的新媒體閱讀生態中我們能看得更清楚，這種經驗和文本的「私人定製」越來越盛行。張嘉佳採用的技術是不

斷拋出情緒的凝結物；金句——以此餵養讀者日漸退化的表達力和思考力。

張嘉佳這種對文本的「五分鐘閱讀」的設置，是出於對傳播的追求，這也正是今天的新媒體閱讀生態中最核心的市場訴求。在當今這個輕閱讀、軟文藝橫陳的時代，對大眾讀者而言，新媒體寫作中的「推文」在閱讀時間的設置上只有五分鐘。在這類寫作的內部，有很多迴異於傳統文學創作和新聞創作的要求，例如，它們被要求在內容上要有新鮮熱辣的時髦性、在語言上要有被表達的「爽」、在閱讀上要有即時的回饋。在接受形態上，它們不僅從內容上征服地鐵上的通勤青年，而且從結構上改變一代青年的閱讀方式，更從語言上重塑他們的語言結構。

雖然，大眾文化中的文學和創作，並不受嚴肅的文學標準的檢閱和約束，一個健康的閱讀生態也並不應提倡每個人都必須要進行嚴肅閱讀，但當一代人的閱讀生態被一味迎合市場的、「私人定製」式的「五分鐘閱讀」模式緊繫籠罩時，他們的視野也將像圍城中的蒼蠅，在被互聯網餵養的便捷、輕鬆與滿足中失去對真實世界「肉身」化的體察和更深刻的認識，成為新媒體時代的信息奴隸。

# 大江奔流不復還

晨 光



從一張紙到一本厚約兩厘米的書，銀行的財務報告見證了香港經濟變遷。建行（亞洲）前身廣東銀行於一九一二年成立後，三易其主，從太平洋亞洲銀行到美國銀行（亞洲），再到中國建設銀行（亞洲），當年在首份財務報告書上簽名的第一任董事會主席陸蓬山，與李煜堂創立廣東銀行，意圖「聚集同志集合資金，從事金山正埠廣東銀行或內外各地的匯兌，進行本港之貿易金融或金融業者所做之各種事業」，今日香港經濟金融已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金融業所做之各種事業琳瑯滿目，建行（亞洲）百年館藏中橫跨一百〇六年的銀行年報，可謂一部香港經濟發展的編年史。

一九一三年廣東銀行發布開業首年財務報告，當時稱為「結冊及報告書」，區區一頁，內容涵蓋董事長對銀行經營情況的簡明點評以及財務數據。不像今日公司年報分為資產負債表、現金流表、利潤表等各項分別編制，一九一二年廣東銀行的結冊會計科目分類不過四大項：進數、支數、存數、欠數，匯兌業務是主要收入來源。香港的多元性和國際性，在廣東銀行的這張結冊上的「匯單」項已露端倪——匯兌業務是主要收入來源。十九世紀末開始，赴美淘金在華興起，不管哪種方式的匯款，必須經過香港才能回到中國內地。這樣四通八達的匯款網絡奠定了日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基礎。



◀建行（亞洲）前身廣東銀行元年結冊（一九一三年） 作者供圖



◀位於香港九龍灣建行中心二十九層的建行（亞洲）百年館藏 作者供圖

這一年，廣東銀行開張不過半年多，稅後利潤近三萬港幣。陸蓬山歡欣鼓舞，宣布董事們首年權當免費義務為銀行效力，利潤不分紅。至一九八八年為美國太平洋銀行併購前，廣東銀行最後一期年報顯示利潤已近一億港幣，資產規模近一百一十億港幣；五年後，利潤更是翻三倍，之後為美國銀行收入囊中；到二〇〇五年中國建設銀行從美國銀行手裏買進，經營十三年後，二〇一八年的稅後利潤飆升至近三十六億港幣，資產規模近五千億。

從一九一二年稅後利潤三萬港幣到二〇一八年的稅後利潤三十六億港幣，與香港首家華資銀行利潤級數增長相對應的是，香港從一九〇〇年到一九八〇年期間，除了一九七〇年和一九八〇年，其餘每隔五年都在「

十大國際銀行中心」榜上有名。尤其是一九六〇末期，伴隨香港經濟迅速發展，大量企業欣欣向榮，香港金融業邁向國際化、多元化。彼時，香港的本地居民收入在一九六一年為六十億港幣，至二〇一八年已達二點八四萬億港幣。

一九一二年創立廣東銀行的大班們希望自主經營華資銀行，以挽回金融權利。如今香港已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以市值計算，全球十大銀行中，中國的銀行佔半壁江山。銀行經營之使命的變遷也在年報中悄然演進。美國銀行（亞洲）時代，滿足客戶需求在二〇〇一年第一次赫然印於年報首頁，之後數年，又先後增加服務股東、社會、投資人、社區方面的內容；到建行（亞洲）宣揚普惠金融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更以龍舟精神培育企業文化，希望成就百年基業。

今日是明日的歷史，一九一三年，廣東銀行第一任董事長陸蓬山在年報中寫下：「信得本行生意必即行進步」，時間流轉至二〇一九年，後人徜徉在建行（亞洲）百年館藏中，遠眺獅子山，不禁吟唱起「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誓相隨，無畏更無懼，同處海角天邊，攜手踏平崎嶇，我哋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建亞博物館裏的老香港」之八，本系列完）

# 一座書城

祝 勇



世間有「一頁宋版，一兩黃金」的說法，當年李自成一把大火，不知燒掉了多少兩黃金，那些美輪美奐的紙葉，變成了一股股的青煙，就在這個世界上消失了，再也不可能把它們找回來。所以說，黃金可求，而古書難覓。曾為紀曉嵐「閱微草堂」題寫匾額的清代學術大師桂馥說，這些善本古籍，「藏之一地，不能藏於天下；藏之一時，不能藏於萬世。」又說：「天下之物，未有私之而可以長據，公之而不能長存者。」他眼裏的「公之」，就是歸朝廷所有，紫禁城，就是天下古書的最佳存放地，那裏最安全，也最能使古書得以「長存」，萬載永傳。其實，紫禁城的「安全」也是相對的，這世界上就沒有一個地方是金石永固、牢不可破的，這座皇家宮殿與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一樣，也經歷着世事的變幻與無常，那一場場把古籍燒淨的大火就證明了這一點。更何況，這世界上萬事萬物，都有生有滅，古書也不例外。紙壽千年絹八百，無論我們怎樣不捨，那些書也終有一天會化為塵土，重新融入大地。

但無論怎樣，我們看到的事實是，當清朝建立，伴隨着大規模的圖書編纂，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搜求古籍運動。所幸，在民間，依舊散存着許多珍貴書籍版本，於是，很多善本秘笈，又漸漸匯聚在紫禁城中。據于敏中、王際華、彭元瑞等人編成的《天祿琳琅書目》（即《書目前編》）記載，「天祿琳琅」藏有宋版七十一部、金版一部、影宋抄本二十部、元版八十五部，明版二百五十二部，總共著錄善本書四百二十九部。

嘉慶二年（公元一七九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晚上，太監用火不慎，引燃了乾清宮，火勢兇猛，很快吞沒了乾清宮和交泰殿，與乾清宮毗連的昭仁殿「天祿琳琅」藏書也全部葬身火海。

化為灰燼的古籍中，有許多曠世珍本。比如宋版《兩漢書》，就是鳳毛麟角的傳世名本，董其昌說，宋版書「歷來最為人所珍重者有三」，一部是《杜詩》，一部是《六臣註文選》，還有一部就是宋版《兩漢書》，這三部書，「鼎足海內者也」。明代王世貞曾用一座花園來換一部宋版《兩漢書》，錢謙益也曾花一千二百兩金購得此書。但這部珍貴的宋版書，

在嘉慶二年的那場大火中，永遠消失了。

已作太上皇的弘曆眼睜睜看着大火奪走了他心愛的名貴古籍，但他不認慫，他不相信幻滅，他像一個不認輸的小孩，決定重建乾清宮，同時恢復往日的特藏。短短一年，乾清宮巨大的輪廓又重新屹立在天宇下。「天祿琳琅」的匾額，又重新懸掛在昭仁殿內。古籍善本，又重新匯聚在昭仁殿中。它們的來路，有徵集、採購，也有抄沒。七個月後，大學士彭元瑞重新編好《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收藏從宋至明的善本共六百五十部，比以任何時候都更加宏富。

《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中的古籍，溥儀挑選了最珍貴的宋元刻本帶到東北偽「滿洲國」，使得國民黨逃台時，這部分最好的版本未能帶走，今天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天祿琳琅」書目，大多是明代刻本。被溥儀帶走的宋元刻本，則在戰爭中歷經流散，現分藏於中國、日本、美國、荷蘭、瑞典等國的博物館、圖書館中，甚至同一部書，都分散在不同國家，比如明刻本《學海》，分藏在十一個國家，加在一起還不完整。一九五九年，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吳仲超將故宮重新收藏的兩百餘部「天祿琳琅」古籍一併撥給北京圖書館（現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值得慶幸的是，《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所藏書籍，如今能夠查到下落的，達到百分之九十。（十）